

第二章 中共菁英甄補、流動與轉型

統治菁英掌握國家行政權力是所有政體的普遍性現象。外界往往從菁英群體的特徵、屬性，說明領導人選拔菁英所重視的條件，以瞭解一國如何甄補菁英。另一方面，在相似的經驗基礎上，社會學途徑亦從總體社會結構與階層的角度說明社會大眾如何得以向上流動、進入政治階層。以此，「菁英流動」實為政治學與社會學皆相當重視的研究課題。

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改革開放後中共領導菁英組成是否出現個人條件的變化？中國大陸政治菁英流動的特性為何？背後是否具有一致的運作邏輯？透過菁英體制特徵演變的問題，對共黨專政—中國的政治發展又將透露何者訊息？在具體回答這些問題之前，讓我們先回顧相關研究成果與理論論述。

本章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節將介紹中共菁英甄補與組成當前研究概況，來說明學界對這些現象的觀察成果。透過菁英組成屬性的回顧，可以發現學者對於中共技術官僚的「性質」有所爭議。於是，第二節帶入比較流動研究的相關論述，說明中共菁英構成的爭議，實來自於政治性（紅）與專業性（專）的集體特徵的組合與消長問題。基於紅與專是中共菁英相當重要的集體屬性，第三節中將進一步理論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菁英屬性演變的模式，在結合中共菁英政治與社會學相關文獻，我們說明如何出現「菁英取代」、「菁英分立」與「菁英融合」等三者對立論述，以及這些論點的內涵差異。系統性地回顧這些既有文獻後，筆者也針對這些理論觀點與研究成果進行評述。

第一節 中共菁英甄補：條件、制度與效果

為了能夠掌握與探索中共政治的特性，菁英政治始終是外界關注的一個課題。雖然隨著時間演變，學者對中共政治研究焦點有所轉移。¹但大體來說對於

¹ 有關於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成果，寇健文主要從不同時期學者所關注的研究焦點，區分為「極權主義」、「派系政治」、「世代政治」、「技術專家治國」等四大途徑。請參見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何思因、陳德昇、耿曙主編，**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台北：

菁英甄補的研究，可以區分以下兩者討論的焦點：首先，在中共專政的環境下，個人如何能夠成為領導菁英的一份子？其次，就總體菁英組成而言，學界目前所理解的中共菁英特徵為何？有何具體的演變趨勢？本節將從外界所認知中共甄補菁英所重視的條件、制度規範以及效果，來說明相關文獻的研究成果。

一、領導人的選拔：非正式關係與制度規範的影響

在中共的政治環境與脈絡下，哪些人得以進入權力核心成為領導菁英？大致來說我們可以從非正式關係與正式制度規範的影響來加以說明。首先，「非正式關係」的相關討論主要延續「極權主義」與「派系政治」的理論脈絡，其強調領導人與菁英之間從屬、平行私人關係的影響，主要還是以領導人自主意志為主。其次，自 80 年代起中共制訂幹部退休制度與幹部四化方針等制度建設以來，正式「制度規範」因素對菁英甄補的影響也開始受到學者重視，以下筆者將從這兩個部份來說明中共菁英甄補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 菁英甄補的非正式關係

由於共黨專政的基本政權架構使然，個人與領導人的關係親疏成為菁英向上流動、晉升相當重要的憑藉。²一般而言，黨領導人對人事更替擁有決斷的裁決與操縱權力，當毛澤東晚年面臨接班問題時，如此的現象也特別被彰顯。當時學者特別關注「毛澤東接班人」更替的現象。1960 年初，接班人劉少奇與毛澤東倡導「三面紅旗」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政策的意見相左，成為文革的頭號革命對象。在劉少奇失勢後，原二號接班人林彪也於 1971 年墜機身亡。這些接班人的更替，讓學者認為毛澤東主導（Mao-in-command）的中國政治情勢讓彰顯了極權主義的基本特質。³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頁 73-99。另外，劉平鄰則是從研究範圍來分類中共政治的研究，他認為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的研究可區分為「中共黨史」、「中共領導人」、「中共作法和作風」、「中共的機構與制度」、「中國大陸民主活動」六類，當然，他並沒有特別將範圍著重於政治菁英上。請見劉平鄰，「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的研究」，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 年），頁 497-525。

² Teiwes 主張在民主集中制下，由於強調決策制訂的權力集中，自然地會鼓勵上下從屬關係的形成，請見 Frederick C.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pp. 239-257.

³ 有關毛澤東領導的模型，請見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under Mao, 1949-1968," in John M. H. Lindbeck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Washington Press, 1971), pp.79-115.

如此一人決斷的模式，在文革後華國鋒與鄧小平的權力鬥爭，以及鄧與陳雲路線之爭下，便產生系統性的改變。這些高層權力鬥爭的現實讓人認識到中共高層並非團結一致的。因此學者開始從高層領導人的路線差異，以及其與部屬的親疏關係來定義中共「派系團體」。以此，包括派系的定義、形成背景，以及集體任離職現象，成為菁英甄補非正式關係討論中的主要焦點。

在定義上，Nathan 認為中共派系政治是一種上下的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關係，也是以派系領導人為核心的人際網絡。派系成員之間將依職務，或與領導人的親疏關係具有上下位階之特性。⁴對此，Tsou 則秉持不同的看法。⁵首先針對意識型態的定位上，他並不同意 Nathan 宣稱意識型態在中國政治中是派系聯盟下之產物，而是仍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特別是不同團體往往有鮮明的立場。其次，他認為 Nathan 對派系政治的描述，忽略中國政治中往往存在著如毛、鄧般單一超強權之領導人，即掌握黨權力核心者。再者，Tsou 認為 Nathan 過於著重正式制度結構的個人從屬關係，然而派系關係也可能出自於平行的個人關係網絡，因而他主張運用「非正式政治」的概念來定義中共政治的特色。

基於「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概念，Dittmer 更進一步將菁英個人權威的進行系統性的分類與界定。⁶他以菁英的權力來源（bases of power）將不同的權力格局分為非正式的個人權威（informal personal authority）與正式的制度權力（formal institutional power）。由於中共派系政治的現象不僅出現在上下的階層位階關係，也有同儕（如同校、同事）關係，這表示「派系政治」本質上的意義在於對正式制度安排以外的範疇，也就是沒有運作規範的政治領域提供運作規則的補充。⁷在如此的定義下，包括「秘書幫」、「太子黨」、「清華幫」等特殊

⁴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3 (January 1973), pp. 34-66.

⁵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 in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65 (January 1976), pp. 98-119;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or a Game of Win All?"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pp. 97-160.

⁶ 所謂的個人權威，指的是個人透過自我的能力與特質，對於支持者建立屬於自我的政治忠誠與人際網絡，為無法轉移的個人威信；至於制度權力，則是指涉領導人的權力基礎，伴隨著正式的職位而來，一旦失去政治職位，則政治影響力將立即大幅下降。見 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October 1978), pp. 26-60.

⁷ 關於中共派系政治的成因，Pye 也從政治文化的觀點來賦予解釋。他認為中共政治認為如此非

人際關係，也成爲學者討論菁英甄補非正式因素影響的重要群體。⁸

在派系集體任職上，不同於早期學者主張得勢派系的贏者全拿（winner-takes-all），學者則開始從得勢政治（bandwagon politics）與權力平衡（power-balancing）的角度來分析派系互動的結果。⁹基於中國政治出現機構分殊的制度化趨勢後，政治權力將不再是不可區分的。因此，Bo 主張派系互動將會因爲政治職位的權力分立以及階層化的前提，而產生權力分配的平衡結果。¹⁰如此的現象特別彰顯在胡錦濤接班後，上海幫與共青團等派系背景菁英的職位分配。Nathan 則認爲從毛澤東至江澤民時期，「派系」顯然是主要的政治動能，但至十六大後出現明顯的改變。從江澤民完整做完任期、沒有繼續留任、以及沒有選定繼承人看來，非正式的派系因素對菁英甄補的影響的確呈現明顯降低的趨勢。¹¹

（二） 菁英甄補的制度性規範

上述討論主要說明中共菁英甄補「派系背景」的非正式關係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隱匿的人際關係的闡述，多是基於菁英共同的背景、屬性或經歷歸納而來。舉例而言，江澤民、朱鎔基崛起之前，上海幫、清華幫等私人關係並不會受到外界關注。雖然這些「事後」歸納的裙帶關係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共菁英政治的本質，然而是不是存在更具體的標準、指標來預測菁英向上晉升與流動的機會？接下來我們將回顧制度性規範的相關研究成果。

制度性因素之所以受到學者重視，主要來自於 80 年代後中共菁英甄補的制

正式關係的運作，並非基於個人之間身份特徵的關係，而深深來自於文化與心理的安全欲求，見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⁸ 關於領導人政治秘書的角色，Pye 與 Li 認爲領導人與秘書可說是最爲緊密的人際關係，同時他們也分析 13 大政治局委員曾經具有秘書身份領導人的仕途發展，請見 Wei Li and Lucian W. Pye, "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pp. 913-936。至於清華幫與太子黨相關的討論，請見 Murray Scot Tanner and Michael J. Feder, "Family Politics, Elite Recruitment, and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pp. 89-119 以及 Cheng Li,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p. 1-30.

⁹ 有關得勢政治與權力平衡的論述，請見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¹⁰ 請見 Zhiyue Bo, *China's Elite Politic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2007), pp. 7-8.

¹¹ 何大明譯，Nathan, Andrew 原著，*中國政治變遷之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台北：巨流圖書，2007 年），頁 48-49。

度建設向上延伸與落實。1982 年中共中央作出正部級職務一般不超過 65 歲，副部級職務不超過 60 歲的年齡規範。同時在 82 憲法中也率先對國家領導人級職務提出任期規定。雖然 90 年代中期以前年齡與任期限制僅存在於正部級領導菁英選拔，¹²但中共十五大喬石依領導人所達成的退休年齡共識，退出政治局常委會後，建立了黨領導人層級的先例。根據政治局 1997 年所宣布的規定，除了極特別情況，所有高層領導（包含政治局常委與國務院正副總理），都不應在年滿 70 歲以後尋求下一任期。¹³這使得超過年齡、任期限制的領導菁英，進一步晉升與留在職務上的機會將大大降低。因此「任期規範」與「年齡限制」可說是中共菁英甄補裡最受關注的制度性規範。¹⁴

中共政治的制度化的趨勢，也讓外界得以從客觀的指標來預測中共領導人的晉升與仕途發展。寇健文、黃霏芝與潘敏從「階梯式生涯發展規律」、「年齡」、「省級領導幹部經驗」等制度化指標來預測中央政治局人選。¹⁵就其認定具有競爭優勢的六位人選中，有五位的確在十七大裡晉升至政治局。這說明的中共菁英甄補制度化因素的影響力，的確是日益重要的。

二、中共菁英組成：跨時演變的圖像

上述的討論，說明了中國大陸菁英「制度」與「非制度」的選拔與運作方式。那麼，就集體屬性而言，改革開放後中共菁英演變趨勢為何？由於領導人的作風、思考模式與行為對共黨國家領導體制構成具絕對的影響力，因而現有相關文獻多透過群體菁英屬性分析，來推測不同領導人的行事風格。¹⁶以下，筆者將分

¹² 詳細的制度演變過程，請參見第四章的整理。

¹³ 請見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40。

¹⁴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見 Yu-shan Wu, "Jiang and After: Technocratic Rule,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and Meteor Politics," in Yun-han Chu, Chih-cheng Lo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9-88; Xiaowei Zang,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lite Behavior in Reform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1, no. 1 (March 2005), pp. 204-217, 此外 2001 年的 *The China Journal* (No.45) 更發行特刊，來探討江澤民時代以來中共政治制度化的特質，請見參考書目。國內的相關研究，請參見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轉力轉移 1978-2004**（台北，五南出版社，2005 年）。

¹⁵ 請見寇健文、黃霏芝、潘敏，「制度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政治局的新人選」，**東亞季刊**，第 37 卷第 2 期（2006 年 7 月），頁 1-38。

¹⁶ 值得注意的，改革開放後省級領導人地位慢慢上升。以十七大政治局為例，九位常委中，有八位具省級領導經歷（除溫家寶外）。在範圍上，除了中央領導菁英外，省級菁英的研究也是近年來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有關中共省級領導人的相關實證研究，則可見 Yi-feng Tao, "The Evolution of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 in Post-Mao China, 1978-98: An Event Analysis of

別從改革開放之前的菁英屬性、鄧小平主導下菁英轉型的趨勢，以及江澤民、胡錦濤主政下的菁英特徵為主軸，說明中共菁英屬性的持續與變遷，來瞭解當前學界對中共菁英組成特性的認知圖像。

（一）改革開放前的菁英屬性

在中共政治菁英特徵與屬性的相關研究裡，主要是針對如「政治局」與「中央委員會」的整體領導集團進行分析，以說明不同領導人下菁英群體的特性。Scalapino 於 1972 年主編的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學界針對中國大陸各類菁英進行系統性分析的第一本專書。¹⁷他以第八、九屆中委會為研究對象，發現毛澤東所批選之第九屆中央委員，沒有一個人能如高崗、劉少奇般資深可能對毛自身政治地位造成威脅。同時，軍人成為此次改選重要的組成份子。這顯示軍權的掌握是毛在歷經與高、劉等人政治鬥爭後重要的考量之一。此外，第九屆中委會雖然吸收了一些群眾代表，但他們卻無法進入政治局成為有決策權的菁英。最後，毛澤東有壓迫專業技能知識份子的傾向。¹⁸

總的來說，在槍桿子出政權下，改革開放前的中共菁英多具軍人、農民與中下階層身份。這顯示這個時期的菁英選拔主要重視個人於黨經歷的資深程度（seniority），例如是否參與長征、抗日戰爭等經驗；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積極參與階級鬥爭的政治忠誠、「無產階級」的家庭背景等屬性。這些基本背景的要求，直到 80 年代初期並無產生系統性的改變。¹⁹

（二）鄧小平主導下的菁英轉型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重新啓用文革時期受迫害的幹部。此時年齡結構老化的問題變得相當嚴重。在此脈絡下，學者也嘗試透過菁英屬性的分析，來瞭解中共高層如何更替菁英。在 1982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與十二大召開的背景下，Lee 首

Provincial Leader Turnover,”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7, no. 4 (July/ August 2001), pp. 90-120; Zhiyue Bo,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 (Armonk, New York, M.E. Shape, Inc., 2002). 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省級領導人的職務流動概況。

¹⁷ 其中包括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地方領導人（福建省、天津、上海、廣州與少數民族地區菁英等）、軍方菁英、北京大學領導人以及文革時期地方黨員的行為等等。

¹⁸ Robert A. Scalapino, “The Transition in Chinese Party Leadership: A Comparison of Eighth and Ninth Central Committees,” in Robert A. Scalapino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p. 67-148.

¹⁹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vol. 28, no. 4 (April 1988), pp. 373-374.

先點出中共改革開放後重用具「技術專長」幹部。他分析 1982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後各層級幹部人事背景，發現擁有大學學歷的菁英有明顯增加的趨勢。²⁰以此，他推論技術官僚未來將導致政治威權主義，以及社會多元主義的國家走向，同時政府對國家控制力也將因此下降。

Li 與 White 自改革開放以來針對中央委員組成屬性所進行的一系列調查，是學界最具系統性地討論中共菁英組成特性變遷的著作。Li 與 White 發現鄧小平上台後主導的十二與十三大中委會，共同的趨勢在於少數民族比例逐漸增加、平均年齡降低、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大量黨政官員取代軍方與大眾組織菁英進入中委會，他們認為這表示中委會特性從原先的「動員者」(mobilizers)、「意識型態倡導者」(ideologues)，轉變為「管理者」(managers)與「技術官僚」(technocrats)。²¹可以預期的，這些新型態菁英將在政治經歷、意識型態觀點、行政能力與價值取向皆與舊革命時期菁英相當不同，也顯示鄧小平時期選拔政治菁英的判準與毛澤東時期主要以個人階級背景、資深制、政治忠誠等反知識份子傾向相左。

(三) 江澤民、胡錦濤下的菁英體制特徵

在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上台後，「技術官僚」成為十五大領導班子的共同特性。這些菁英除了擁有專業技術的教育背景、專業經歷，同時也是黨政領導班子。因而 Li 與 White 認為江時期的技術官僚，並非僅位於前期具歷史功勳的領導人的庇蔭下 (political patron)，而是全面的成為中國政治的主導者，出現技術官僚治國 (technocracy)。²²他們的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92.4% 的中央委員具大學以上學歷。同時，他們認為江時代黨菁英體制特性為結合現代化專業個人條件以及舊革命時代菁英政治支持，這顯示了歷經文革後「技術官僚」成為中共重新統合菁英凝聚力的主要原則。²³

²⁰ Hong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256, pp. 422-423.

²¹ 請見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pp. 371-399.

²² 十五大新任的七位政治局常委，以及三分之二的政治局委員，皆為 Li 與 White 定義下的「技術官僚」。請見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8, no. 3 (March 1998), p. 232.

²³ *Ibid.*, p. 264.

2002 年胡錦濤接班後，Li 與 White 也持續關注十六大領導體制的特色。進入 21 世紀後，他們主要關注領導幹部的「世代交替」與「團派」勢力的興起。首先，他們發現十六大中委會有高達 50.6% 的新進委員（含候補中委），²⁴同時「文革世代」的比例也大量增加，達 47.5%。²⁵Li 認為這些新菁英由於在成長、求學甚至於剛進入社會時正經歷文革動盪年代，加上不如舊世代有長征與抗日的共同歷史經驗，因此將較缺乏團結度，同時對意識型態也應無共同信念。他們將傾向透過經濟建設的成就來穩固自身的統治正當性。²⁶此外，共青團與上海幫的派系影響力消長，也是他們的關注焦點。²⁷

（四）「技術官僚」還是「政治—技術官僚」聯盟？

隨著時間的演進，菁英「專業化」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政治菁英組成的主要轉變趨勢。在 90 年代中期，特別是十四大人事改組後，外界曾經出現「技術官僚治國」與「政治—技術官僚」的爭辯。Li 與 White 認為中共領導人多具有工程、自然科學專業，同時曾任職這些相關領域的職務，呈現技術官僚治國。²⁸對此，Zang 則主張中共政治菁英實為「政治—技術官僚」的組合。²⁹他認為黨、政府體系、群眾組織、軍隊出身的官僚（bureaucrats），不能與技術官僚混為一談。從中央委員過去職務歷程來看，加入軍方出身職務歷練的比例後，十四屆中央委員最多僅有 46.55% 可視為「技術官僚」；至於官僚出身的比例則為 40.74%。³⁰因此，他認為中共領導人實為政治—技術官僚的聯盟。儘管如此，中共菁英的技術專家特質，不能否認的是仍意味著隨著時間演進，意識型態作用在黨領導班子逐漸淡化的趨勢。

本節的文獻回顧，主要集中於中共菁英甄補的相關研究成果，包括中共菁英甄補的非正式關係、制度規範的不同面向，以及甄補的實質效果。透過上述的討

²⁴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u Gets What?"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July/ August 2003), p. 559.

²⁵ *Ibid.*, p. 566.

²⁶ Cheng Li,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 37.

²⁷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 594-597.

²⁸ 有關技術官僚的定義，可見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Technocracy," *China Quarterly*, no. 121 (March 1990), p. 19.

²⁹ Xiaowei Zang,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August 1993), pp. 787-803.

³⁰ *Ibid.*, p. 799.

論，可以發現雖然學者點出近年來菁英非正式關係與制度規範兩者因素影響力呈現消長的重要趨勢，然而在菁英組成屬性的實證分析裡卻止於基於歷屆中央委員組成人員背景的數據分析，僅著重不同領導人下菁英組成特色。這些研究雖然有助於我們瞭解當時時空背景與菁英組成的關聯性，但卻無法對中國大陸政治菁英整體趨勢的演變提供完整的理論圖像，以及相對應的分析結果。

另一方面，關於菁英組成的屬性，現有文獻存在著「技術官僚」還是「政治—技術官僚」的歧異。其中的爭議點在於技術菁英是否具政治職業家的官僚特質，爲了釐清進一步這兩個概念的爭議之處。接下來，我們將帶入社會學在菁英流動裡所強調的個人條件論述，來探討背後更深層的理论意義。

第二節 政治性、專業性與菁英轉型

透過上節的探討，可以發現既有文獻對中國大陸政治菁英屬性存在爭議。在本節中，筆者將帶入社會學對於中共「菁英流動」課題的相關論述，以進一步釐清其爭議所在。從總體社會結構與階層來看，透過政治菁英組成特徵來說明社會大眾得以向上流動的原因，亦是相當典型的社會學研究課題。政治菁英是處於政治階層金字塔頂端，掌握決策影響力與資源分配的團體，那麼，菁英階層具有哪些特徵、屬性？具體來說必須探究的是政治階層與社會結構的關聯性。³¹透過比較研究，Putnam 也提出「不斷擴大的不等比例性法則」(the law of increasing disproportion)。他發現不論在民主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地位越高、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成爲菁英份子爲一普遍性現象，同時亦有不斷擴大的趨勢。³²這表示菁英構成屬性的集體屬性，確實偏向某些社會特徵。

關於中共菁英是「技術官僚」還是「政治—技術官僚」的爭辯，其背後意涵

³¹ 可以預期的是，菁英階層與社會結構具有兩者極端的組合形式。首先「獨立模型」指的是個人的政治地位與其社會經濟、職業、教育等背景皆不相關。換句話說，菁英等比例代表每種社會類型。其次，「凝集模型」是個人政治階層地位與特定社會特徵地位具有緊密關聯性。例如政治菁英很可能來自於顯赫的家庭背景、良好的經濟條件地位與受過高等教育，顯然地，凝結模型後符合政治現實，請見 Robert D. Putna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pp. 21-26.

³² *Ibid.*, pp. 33-38.

即是菁英「紅」與「專」條件的組合與演變問題。本節從這兩者個人條件切入，說明菁英「紅」與「專」的條件如何受到關注。這些理論論述主要來自於政權型態相似的蘇維埃（Soviet-type）社會主義國家之經驗。以下，我們將分別說明菁英政治性、專業性條件興起的理論起源，以及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菁英的政治性條件：起源與意涵

菁英與社會大眾除了在性別、社會地位與教育條件具有差異外，Djilas 的”*The New Class*”一書率先揭示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新階級」。³³他指出「新階級」形成在共產黨的革命鬥爭時期。在這個時期，共黨黨籍象徵的是一種光榮。然而，在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後，史達林卻廢止一切形式的黨內討論，並規定只有黨中央才有權對意識型態表示意見；同時也運用差異相當可觀的工資制以及各種特權利益的分送大力推行工業化建設。在史達林的領導下，黨成爲一群對意識型態沒有興趣的人，而是全心全意的維護他們賴以擁有特權的制度，新階級的地位便隨之鞏固。其中，維繫這個制度的主要機制便是共產黨擁有嚴密的組織結構、行政權力的壟斷與強烈的排他性。這讓具有黨員身份的個人將可獲得社會資源挹注，包括獲得良好教育、專業知識的訓練，較好工作機會等。這些共產國家官僚也憑著壟斷國家權力，甚至恣意的分享並獲取國家財產。Djilas 更指出，「共黨黨員成爲新階級」的現象並非僅是蘇聯的獨特現象，而是在所有蘇維埃式（Soviet-type）的共產主義國家中。³⁴對於社會大眾而言，進入菁英階層的唯一條件是對黨與新階級的忠誠與絕對效忠，必須要具備的具體條件則是瞭解與發揚教條的能力。³⁵

Djilas 對共產社會的深刻描繪，成爲往後學者探討社會主義國家菁英流動的重要基礎。他率先指出「政治審查」（political screening），特別是個人「共黨黨員」身份於共黨國家向上流動的重要性。在中國社會裡，Walder 所提出的「新傳統主義」也點出相當類似的現象。³⁶他以工廠生活爲例，發現幹部透過黨在制度上的規範，從成員的參與、發言等表現來建立個人的關係網絡。共黨社會

³³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s* (New York: Praeger, 1957), pp. 37-69.

³⁴ *Ibid.*, p. 53.

³⁵ *Ibid.*, p. 60.

³⁶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的制度設計是將工廠的組織政治化，透過組織掌控，培養積極份子與建立監視系統來確保工廠生活的政治性。然而，幹部與這些積極分子卻透過特權利益的交換，發展成私人依附關係的結果。換句話說，那些通過政治審查的份子，的確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好處。同時，Walder 也認為即便中共致力於經濟現代化建設，但在社會流動中個人政治性（political dimension）條件的重要性卻絲毫未減。³⁷Zhou、Dickson 與 Rublee 等人也透過調查研究的實證資料，驗證中國社會裡黨員身份會為個人帶來更多教育、收入與工作機會等物質上的利益。³⁸因此個人黨員身份的政治性條件，可說是中國社會裡個人能夠向上流動的主要因素。

二、菁英的專業性條件：技術官僚崛起下的菁英轉型

除了「紅」之外，另一個受到學者關注菁英集體特徵是共黨國家「技術官僚」的崛起，即菁英「專業化」的轉型傾向。³⁹由於不同社會裡存在各自強調的社會價值，如政教合一的社會裡菁英多由具有神職人員身份；在強調政治正統（political orthodoxy）的社會中，能否得到領導人的背書與承認會是成為政治菁英的前提，因而如此菁英型態的轉變，主要來自於社會的功能性需求。⁴⁰

總的來說，當共黨領導人開始著重經濟建設與工業化發展，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訓練的專業人士便成為菁英選拔的最佳人選。Parkin 認為：「伴隨著強調工業（生產）效率與趨勢的出現，對於政治權威組成份子工作的指派，將不僅只是因政治忠誠的報酬性派遣，而是更基於正式的個人能力。」⁴¹包括蘇聯、匈牙利、

³⁷ Andrew G. Walder,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Richard G. Braungart and Margaret G. Braungart eds.,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State*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90), pp. 49-65.

³⁸ 請見 Xueguang Zhou, "Partial Reform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the Post-Mao Er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8, no. 3 (October 1995), pp. 440-468 以及 Bruce J. Dickson and Maria Rost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1 (February 2000), pp. 87-112.

³⁹ 「技術官僚」首先出現於形容 1930 年代的美國政府。一次大戰後隨即而來的經濟大恐慌造成經濟秩序的混亂與社會問題叢生，讓學者開始認為政府應由科學家、工程師等技術專家組成來解決問題。可見 Henry Elsner, Jr., *The Technocrats: Prophets of Automatio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3.

⁴⁰ Robert D. Putna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pp. 169-172.

⁴¹ Frank Parkin, "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0, no. 4 (December 1969), p. 365.

東德、南斯拉夫等國研究都顯示了專業分子被選拔進入菁英階層的傾向。⁴²這些研究的共同點，在於強調個人教育條件的社會競爭力在共產國家中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透過菁英集體屬性的圖像描述，上一節裡也顯示中共菁英的確存在邁向專業化的轉型趨勢。在比較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菁英專業化轉型後，Li 與 White 從環境因素與內部因素歸納出六個中國大陸技術官僚興起的原因。環境因素上包括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增加、文革後面臨意識型態的危機、經濟現代化建設的人才需求；至於內部因素則是領導人的有意支持（technocrat patrons）、知識份子的需求，以及幹部的老化等。⁴³特別重要的是，由於黨重視菁英須具備技術訓練與行政能力等專業性條件，使得「領導人支持」更是專業菁英興起的決定性因素。然而，這些強調菁英專業化轉型的文獻卻鮮少進一步探討「紅」與「專」如何在各個國家融合的問題。可以預想的是，過度強調專業條件於菁英選拔的重要性，其背後的意涵便是政治忠誠的重要性將逐漸降低。⁴⁴

在本節中，筆者主要透過比較菁英流動的理論框架，說明中共菁英組成屬性具有「政治性」與「專業性」條件的集體特質。透過這些集體條件的釐清，我們可以將「技術官僚」、「政治—技術官僚」的爭辯，進一步理論化成不同菁英體制演變模式的對立論述。

第三節 菁英流動的對立論述：菁英取代、分立還是融合？

如上所述，「紅」與「專」是共黨國家中社會大眾得以向上流動，進入菁英階層的最重要條件。那麼，在中共的菁英甄補模式中，此兩者條件如何進一步融

⁴² 關於蘇聯的研究成果，請見 Barbara A. Anders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Equality, Excellent, and Other Issu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8 (Winter 1975), pp. 397-412；而 Grusky 等人則是針對工業化與發展中國家（包括匈牙利與波蘭）共 16 國進行比較研究，請見 David B. Grusky and Robert M. Hauser,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 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16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9, no.1 (February 1984), pp. 19-38.

⁴³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Technocracy," pp. 9-16.

⁴⁴ Andrew G. Walder, "Career Mobility and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3 (June 1995), p. 311.

合？抑或何者條件較為重要？如何融合「紅」與「專」成爲菁英流動理論探討的核心議題。具體來說，在中共菁英日漸具專業化集體特質下，隨著時間演變大致可區分爲「菁英取代」、「菁英分立」與「菁英融合」等三者不同對立觀點。接下來筆者將介紹這三者對立論述的理論內涵。

一、菁英取代論

首先，菁英取代論較爲直觀，其強調中共在重視經濟現代化建設下將重用專業菁英。如我們在第一節所描述的，在探討中共菁英屬性的既有文獻裡，領導菁英的現代化、專業化轉型是受到外界關注的共同趨勢。在 80 年代初期菁英總體學歷提升的同時，Lee 便預言技術官僚將取代革命幹部成爲中共未來政治的主導者。⁴⁵Li 與 White 也在十五大後，說明如此技術官僚治國的趨勢。⁴⁶同時，也由於「幹部四化」選拔政策裡「革命化」是較難被定義的，因而 Fewsmith 強調客觀的年齡、教育程度等指標，將成爲中共日後選拔幹部的主要標準。⁴⁷

這些研究的共同之處，便是強調在菁英甄補在個人專業性條件日益重要下將由技術官僚取代革命幹部。然而，這些研究並不系統性的談論技術官僚是否具備「政治性條件」之問題，僅描述如此專業性菁英的「取代」趨勢。

二、菁英分立論：功能分殊下的二元菁英甄補

「政治—技術官僚」主張中共菁英爲政治性菁英與專業性菁英的分立結合，呈現二元菁英的特色。在說明技術官僚的菁英取代論點後，接著我們進一步介紹菁英分立論的理論緣起與內涵。

在 Djilas 提出新階級的現象後，學者開始關注這個階級的組成特性的問題。異於 Djilas 以階級分析的途徑，Konrád 與 Szelényi 以韋伯的官僚途徑分析知識份子 (intellectual) 如何走入權力核心。他們從目的論 (teleological) 的標準，定義「知識份子」並非僅指涉某種教育專業背景、行業或能力，而是基於個人認定在其所屬的社會位置是否出類拔萃。因此，除了專業知識外，這些知識份子對權力

⁴⁵ 同本章註 20。

⁴⁶ 同本章註 22。

⁴⁷ Joseph Fewsmith,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2001), p. 67.

而熱衷與渴望，成為這些知識份子獲得權力的主要條件。⁴⁸他們以匈牙利為例，認為後史達林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將會為官僚所主導。在經濟改革推動的背景下，「紅」的政府官員將會與「專」的技術官僚份子共享權力，運用推行科學與工業化建設的方式，來再次正當化共黨的統治權，成為成熟的社會主義（*mature socialism*）國家。⁴⁹

然而，與他們預期不同的是，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Kadar）礙於蘇聯壓力不得不回到保守路線，將這些知識份子排出在統治階層外。但是，經濟改革對社會結構革命性的改變卻隱然形成，匈牙利出現了二元社會階層。Szelényi 進一步主張，那些因為經改、市場化帶來好處的私有戶，將進一步形成自有的社會結構。⁵⁰因而進入 80 年代後，那些具有開明思想的黨菁英為了維持政治統治地位，又逐漸與專業菁英形成二元菁英聯盟。他們將會給予專業技術人員某些特權，來交換這些人對社會主義政權的效忠與服務，藉此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⁵¹

Walder 以匈牙利模式針對中國大陸菁英流動進行實證研究。⁵²在運用大量的調查資料下，他發現從事「高威望、較具資源分配權力」的組織幹部多擁有個人黨員身份的政治條件與專業的學歷條件；但對於「技術專業」職務而言，個人的教育專業背景才是主政者選拔菁英的憑藉，黨員身份不會是上級的考量依據。基本上，Walder 的實證結果證實 Konrád 等人所提出的二元菁英同盟說法。以此，Zang 從制度安排說明中國大陸黨務與政府部門菁英甄補的差異。他從功能分殊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的角度，主張共黨專政下黨與政府部門的職能差異將會更被凸顯。⁵³改革開放以來，領導人必須加強機構專業化與分殊化以加快經濟建設的步伐。在如此的脈絡下，政府部門主要任務為經濟發展，產生專業治理人才的需求；黨則是在意識型態上對政府提供政治指導。因此，不同部門的領導

⁴⁸ 請見 George Konrád and van Szelé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pp. 3-11, 該書對於往後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流動的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有關知識份子的權力之路論述的理論審思，可見 Katherine Verdery, "Rereading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Theory and Society*, no. 34 (Spring 2005), pp. 1-36.

⁴⁹ Ivan Szelényi, "The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 Project: An Auto-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5, no. 2 (1987), p. 107.

⁵⁰ *Ibid.*, p. 126.

⁵¹ *Ibid.*, pp. 135-140.

⁵² Andrew G. Walder, "Career Mobility and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pp. 309-328.

⁵³ Xiaowei Zang, "Technical Training, Sponsored Mobility, 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Elite Formation in China in the Reform Er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February 2006), pp. 39-57.

崗位對於領導幹部的條件，特別是政治忠誠與學歷背景應有不同的組合。他運用 1989 年與 1994 年的副部級領導菁英資料，驗證了菁英若擁有工程財經背景則較可能任職於政府專業部門；而黨齡越高的菁英則傾向於黨務部門任職。至於在年齡、性別與教育程度等屬性上，部門之間則沒有太大差異。

功能分述的論述帶入了二元菁英的理論意涵。對菁英體制而言，該理論上主張菁英的「紅」與「專」的條件組合，主要是依循職務職能差異而分別存在的。在不同（黨、政）機構的任務、制度與運作方式下，中國大陸黨務與政府將針對部門需求來甄補適合的菁英，形成二元菁英型態（elite-dualism）。⁵⁴

三、菁英融合論：政黨贊助的理論基礎

除了菁英取代論與菁英分立論外，另一項對立論述為「菁英融合」的觀點。融合論者強調中共這些具專業知識、技能的技術官僚，實來自於黨有意識的栽培與贊助，因此這些菁英同時具備政治忠誠以及專業技能的雙重特徵，融合了紅與專的特長。接著，筆者也說明融合論觀點的理論緣起與內涵。

融合論的觀點始於 Turner 所提出的「贊助式流動」與「競爭式流動」的概念。在檢視英、美兩國的教育體系與社會階層後，Turner 發現在英國社會中，學員是否能進入都市、工業化程度較高學校就讀，取決於其社會背景以及既有社會菁英的關係，這與美國社會中較為開放的競爭式流動相當不同。在進入學校前，兩者不同流動模式已讓學校體系先對候選菁英進行初步的篩選。在贊助式流動中，既有菁英對屬意的代理人進行有計畫的培育，讓他們在獲得專業技能後能理所當然地進入菁英階層。相反地，在競爭式流動體系中沒有特定的決策者能片面決定誰應該成為菁英。在公平規則下，菁英候選人透過公開的競爭成為「菁英」，而此種流動體系下的菁英身份，便是對競爭者表現的肯定與獎勵。⁵⁵

以此，Li 與 Walder 按贊助式流動的理論脈絡，探討中共菁英入黨時機於生命歷程的重要性，提出「政黨贊助式流動」(party-sponsored mobility) 理論。⁵⁶他

⁵⁴ Xiaowei Zang,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04).

⁵⁵ 請見 Ralph H. Turner,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5, no. 6 (December 1960), pp. 855-867.

⁵⁶ Bobai Li and Andrew G. Walder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們主張個人的黨員身份，並非如專業知識、技能一般為個人條件，而是一種「會員」的身份。菁英候選人若越早獲得黨員身份的認可，則在生命歷程中將會獲得更多的好處。這意味著這些早入黨的菁英受將會受到上級領導的重視與栽培。而對於那些中年之後入黨者而言，其黨員身份則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或黨對他們貢獻的肯定，對他們的未來發展並無實質幫助。⁵⁷

贊助式流動具有「時間相依」(time-dependent)的意涵。Li 與 Walder 基本上同意共黨的黨員身份是成為政治菁英的必要條件，但如此的條件並不充分。原因在於加入共產黨，並不會讓特定個人變成政治菁英。因此，他們更為關注菁英候選人的入黨時間，認為中共會優先選拔年輕的政治積極份子入黨，培養他們進入接班體系，走入另一條栽培、晉升管道。這些黨培育的份子可能一開始不見得有受過良好的教育訓練，也不具備專業知識，但加入共黨將會增加他們受培育的機會，得到社會上競爭的優勢。在大量的調查資料支持下，Li 等人也透過的實證研究證明政黨贊助現象的存在。因此，能夠具備專業知識、技能的專業菁英，基本上皆是來自於中共有意識的贊助與栽培，方能成為領導接班一份子。

第四節 文獻評述與小結

本章主要從菁英甄補與菁英組成演變出發，回顧當前中國大陸政治菁英的研究成果。由於中共菁英屬性具有「技術官僚」與「政治—技術官僚聯盟」的爭辯。為此，我們也帶入比較流動研究的相關文獻，將中共菁英集體特徵的屬性理論化成不同對立觀點。在說明「菁英取代」、「菁英分立」與「菁英融合」等三者對立論述後，本節將對現有的研究成果提出評述。

首先，關於中共菁英集體屬性的探討，當前文獻多著重不同領導人下中央委員的組成分析。這些研究雖然有助於我們瞭解特定時空環境與菁英組成的關係，但卻無法對中國大陸政治菁英整體趨勢演變提供理論上的解釋與分析。更重要的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6, no. 5 (March 2001), pp. 1371-1408.

⁵⁷ *Ibid.*, pp. 1377-1378.

是，在菁英甄補非正式關係與制度規範影響力之消長下，這些過於著重描繪特定時空的菁英集體特徵描述，並不具有與甄補因素研究成果對話的空間。因此，我們並無法從現有的文獻，來刻劃改革開放以來中共菁英甄補與流動演變的整體圖像。

其次，針對結合比較流動理論所歸納出的「菁英取代」、「菁英分立」與「菁英融合」等論述，雖然這三者論述在理論上具對話空間，但並不具實證資料層次上的對話基礎。舉例而言，菁英取代的說法僅來自於隨著時間演變下輪替，領導菁英具普遍專業化特徵。分立論則是基於中共副部級以上菁英不同部門的比較。至於菁英融合的政黨贊助論，則是透過中國大陸城市的調查資料，以論述政黨贊助於個人生命旅程的影響。因此，關於中國大陸高層菁英流動的特性，仍待更多研究加以證實。特別在於政黨贊助的說法並非基於菁英，而是來自調查資料。

再者，進一步來說，不論「菁英取代」、「菁英分立」與「菁英融合」觀點，雖然存在著中共菁英隨著時間，將呈現不同方向的演變預設。然而，基本上卻皆屬現象的「描述」。具體來說，我們可將共黨國家菁英以政治性與專業性的條件，以可能的組合分為：(1) 政治性與專業性兼具、(2) 僅具政治性、(3) 僅具專業性三者（理論上應不存在兩者皆不具者）。菁英取代論強調的是從(2)至(3)的轉型組合。菁英分立論則主張從(2)演變至(2)與(3)的二元組合結果。菁英融合論則認為從(2)至(1)的轉型結果。但是，除了菁英取代論強調中共重視經濟現代化建設的政策轉移外，其他論點並沒有進一步論述如此菁英轉型演變的邏輯、動力乃至於機制，特別是黨在菁英轉型過程裡所扮演的角色。這也讓我們難以從現有文獻對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軌跡的特殊性提出解釋。

第四，如 Djilas 新階級的描述，假定我們同意政治性是中共建政初期，甚至是毛澤東時期菁英必須具備的條件。那麼，必須釐清的問題焦點，便是改革開放以來專業菁英是否兼具「政治性」，以及菁英政治性所呈現的演變趨勢。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在於從後共黨國家的經驗裡，專業菁英在政體轉型後多仍持續位於要職的「再生」現象。⁵⁸正由於具有專業知識者的菁英候選人是多數政治體制

⁵⁸ 針對後共黨國家面臨政體轉型的菁英流動，Szelényi 等人提出「再生」與「循環」的對立命題。菁英再生論 (elite reproduction theory) 指的是原有共產政體菁英之所以於政府體系佔有一席之地，便是因為他們在政治階層中具有生存的本領。即便處於外在政權轉型影響下，菁英的政治、

下優先被考慮甄補的對象，因而這些菁英能否掌握權力並不取決於共黨政權能否繼續。如此的關聯性提供研究者從菁英途徑解釋中國大陸政體發展一個重要的連結點—「菁英衝突」的可能性評估，而這也是多數社會學者在探索菁英流動現象時較為忽略的面向。

最後，在中國大陸菁英政治的相關研究中，「派系政治」一直是學者特別關注的焦點。然而僅關注這些菁英次團體的互動與權力消長，並無法直接聯繫中共政體發展的課題。值得強調的是，一國政體型態的轉型、持續與演變，向來就是政治學所關心的核心議題。而透過菁英甄補與流動持續與演變的釐清，更能提供我們解釋與預測中國大陸政體發展與走向的線索。因而，本研究希望透過中共菁英流動持續與變遷的跨時間系統性分析，能夠補足中共菁英政治原先較為缺乏的集體途徑。同時，也對菁英流動的三者對立論述，提出實證研究的分析結果以及理論解釋。

經濟資本仍具有有效的可轉換性 (convertibility)，多數菁英的優勢地位不會有所改變。另一方面菁英循環論 (elite circulation theory) 則認為共黨國家的轉型已對政治階層產生結構性的轉變，在新增補規則的建立將產生新的社會需求，故新興政治菁英將被甄補進政治系統獲取主要政治職務。可見 Iván Szelényi and Szonja Szelényi, "Circulation or Reproduction of Elites during the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Introdu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4, no. 5 (October 1995), p. 616.